

22.

一孩政策的终结何以 关系重大？

葛苏珊 (Susan Greenhalgh)

2015年10月，在戏剧性的《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三十五年又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简短公报宣告，自2016年1月1日开始，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从而悄无声息地终结了独生子女政策。

有人认为声名狼藉的一孩政策的终结是中国及其民众的重大转折。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许多新闻记者与学者只是把一孩政策理解为一项人口政策，其实内容远不止这些。该政策的设计以提升中国的人口“素质”、同时控制其数量为目标，是宏大雄伟的国家战略规划的核心部分，旨在把落后的中国民众改造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与现代公民，与世界强国的地位相称。在探讨一孩政策终结的意义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更宏大的宗旨。

正负两方面（负面为主）的影响

一孩政策是有史以来对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所实施的最严厉和最不受欢迎的生育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漏洞百出——从人口方面看并无必要，从政治上看也并不可行——但是中国政府

仍下定决心要严格实施，只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出所料，这项政策深深改造了中国及其民众。

部分影响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尽管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温和，并很难估算—中国政府宣称少生四亿人的数字被其夸大了至少50%—但兼顾质素和数量的人口政策在结合市场力量和社会变革后创造出一代受过良好教育、健康并有见识的世界公民，足以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该政策还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创造具有现代国家的社会与人口特征的公民。

然而，在这些成就背后，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该如何衡量该政策在几十年里对农村女性造成的健康和心理损害？我们该如何估算迫切希望生育儿子的女性通过杀婴，以及后来的人工流产方式所造成的女婴生命损失？我们又该如何估算因为家庭希望破灭或独生子女死亡，为父母带来的严重打击？此类伤害都是难以计算和无可挽回的。

生育现代化不仅创造出符合所谓崭新、现代与符合科学规范的个体（优秀儿童、科学育儿妈妈等），还创造了偏常者—所谓的“后进分子”，因为不符合规范而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道德体制之外。有一大类穷人正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产子的夫妇。这些父母会受到政府的严厉处罚，而非计划生育的子女（被称为“黑娃”）的遭遇就更加悲惨。如果超生父母未能为他们的孩子办理入户（即获得身份证明），这些孩子会被视作没有社会身份的人，因而无法获得国家福利，从上学、医疗，到工作、结婚甚至是死亡的权利。另一种类型的“非现代人”包括那些不接受政府对生育、性别与婚姻的传统规范的人。同性恋伴侣、未婚妈妈，以及无子女的成年人的生活受到社会排斥，并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一孩政策还扭曲中国的人口结构，导致人口老化加速，工作年龄段的家庭成员离家工作，产生为数超过1.5亿的一代留守儿童，并令他们要独自承受供养年迈父母的负担。由于许多农民偏好生育男孩，该政策造成非常悬殊的婴儿性别差距：男女孩

的比例达到119:100，处于世界最高的行列。当女性与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结婚的同时，大约有2,000-4,000万处于社会底层的男子依然维持单身，无法以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成婚。这些人被称为“光棍”，只能过着艰难的生活。

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孩子？

一孩政策如今被废除后，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两个主要的回答是：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孩子。

西方媒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欢呼，称其结束了数十年的“残酷恐怖”——这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说法——并开启了中国夫妇享有生育自由的新时代。撇除这些说法背后问题重重的假设(中国缺乏自由，而美国相对拥有自由，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在三十五年里没有作出重大改变)，我们应先聚焦这一广为流传的论点本身。如果结合中国的政治语言和治理结构来仔细审视生育政策，会发现如果没有其他改变，结束一孩政策并不会显著扩大生育自由的范围。

中国官方对政策调整的解释很清楚：这与生育权利无关，而完全是为了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作年龄段人口减少与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威胁到中国跻身经济繁荣的最发达国家之列的规划。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人口被视为“关系国家长期利益的战略问题”。即使该政策得到进一步放宽(如纳入未婚伴侣或允许生三个孩子)，同样不会大幅度扩大个人的生育自由，因为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最高利益。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人口计划一直是国家发展规划的其中一部分。与其他国家鼓励夫妇为生育小孩做好规划的家庭计划项目不同，中国的计划生育则是由政府来决定家庭应该生育多少个孩子，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家庭计划”这个术语在中国的环境中其实属用词不当。)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5月宣布，计划生育依然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少数几项“基本国策”之一。

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对生育的规划指导。虽然1983年组建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与卫生部合并后，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负责生育控制的政府机构依然存在，如政府对生育的监督、对违反政策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对所在地生育率超标的地方官员进行的处罚、一部全国性法规与无数的人口监管规范，以及配备有数亿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政府与准政府官员。在该政策变革中，政府既没有重新界定人口工作，也没有取消指导生育工作的制度和法律架构；反而只是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从允许夫妻二人中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推出的新规定），到普遍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中国的人口与发展规划者们显然希望这一政策改变能刺激婴儿潮的产生，促进生育率一目前处于每名女性生育1.7个子女的不可持续的水平。（专家认为要避免人口减少，生育率应达到2.1。）中国近期有关政策调整的历史表明，生育率的上升幅度可能较小。在2013年政策放宽后，有资格生育两个孩子的1100万对夫妇中，仅有15%实际上生育了二胎。在大城市里，这个数字还要减半。虽然许多夫妇依然梦想能育有一儿一女，组成“美满家庭”，但是养育出一个高素质的孩子所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却让他们的梦想难以实现，除非他们极为富裕。愈来愈多国家尝试提升已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但纷纷失败。中国也很可能会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里陷入生育率极低的境地。

从政府到市场——前方的危险

如果政策调整不能带来生育自由，也无法重新加速人口增长，它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于它，我们是该庆贺，还是担忧？作为唱反调的角色，我想指出削弱政府的控制后会带来一定风险，原因是市场的力量将取代政府的势力。让市场来塑造生育观念和行行为看似更能被接受，因为市场力量是靠改变个人

的意愿来间接（并且多数时候是无形地）发挥作用的。然而，市场也具有潜在危险的影响。在制定政策规则时，政府采取高压手段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社会各界之间的公平性，以避免集体抗议。官方的规范虽然在执行中缺乏章法，有时甚至完全得不到贯彻，却具有公平性质——那就是共同承受痛苦——要求整整一代人为将来世代的幸福作出牺牲。相反在市场上，现实的惯例则是根据支付能力而造成的不平等，结果导致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尤其是当中国自1990年代坚决融入全球市场以来，市场力量与消费者法则在生育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广泛，导致了富人与穷人在生育上出现巨大鸿沟。政府强烈打压此类趋势，但收效甚微。在如今的中国，其中一样可以用钱买来的东西就是“超生”的孩子，而这已经成为重要地位的象征。穷人不得不遵守生育规则，以避免沉重的罚款。而富有名流组成的新阶层——最受到瞩目的包括足球明星郝海东与电影制片人张艺谋等——却公开违反一孩政策，乐意支付罚款去换取他们想生育的孩子数目。

用金钱可以买来的另一样东西就是年轻母亲的顶级医疗护理。如果说1980-1990年代的好妈妈们是为生育高素质的孩子而牺牲自己，如今则是不惜花钱让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且在中国新兴的生育护理中心享受定制的医疗和美容服务。在生育后“坐月子”的传统习惯也变成阶层竞争的渠道。富人可以花费3万美元在奢华的生育会所度过28天的分娩期，享受全天候护理；中产阶级只能请保姆来家里帮忙；穷人或许在产后根本得不到休息。

对富人来说，金钱还可以解决不育问题，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快速增多。尽管代孕是非法行为，但有能力支付24万美元并愿意承担风险的父母却可以雇用代孕母亲来帮自己怀胎。金钱同样能买到美国的出生证明。生育旅游成了大生意，特别是在美国加州。愿意支付6万美元、并有幸避开警察打击的中国夫妇

可以成功在美国产子，不单可以为孩子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甚至在将来还可以为自己取得绿卡。随着一孩政策的终结，生育背后的这些驱动力将更加向市场倾斜，在医疗服务、家庭规模与社会地位方面进一步扩大已经很严重的阶层差距。

展示世界好公民形象的机遇

世界许多国家均认为中国的强制性生育政策公然违反国际道德规范——选择生育多少孩子应该是夫妇间的自由权利。一孩政策的制定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通过快速降低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对世界的整体福祉作出重要贡献，应该作为负责任、高品德的国际社会成员而备受尊重。然而，随着1980年代早期有关侵犯人权的新闻被大肆宣扬，这一希望很快破灭。对于控制生育率带来的建设性效果，也被人们对中国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所抱有的忧虑所淹没。

中国以外的人很少知道，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消除粗暴的做法，通过逐渐与国际上可接受的惯例接轨，来改进这项工作的合法性。生育意愿已降至历史低位，使这种强制手段变得愈来愈没有必要。虽然一孩政策目前已终结，有关的伦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项生育政策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未解决，甚至未被承认。今天是中国难得的机遇，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消除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造成的某些最坏影响，展示世界好公民的形象，以赢取其自认为应得的赞誉。在中国可以采取的许多有意义的行动中，如下三项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中国的党和政府应该尽快纠正对计划外生育的人的错误做法，为他们提供户口登记，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国民的所有福利。第二，为缓解“光棍”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承认他们是一孩政策的受害者，或采用官方语言，承认他们“为国家作出牺牲”，并给予他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社会与经济

援助。第三，党和政府应该放弃一孩政策背后对家庭结构坚持保守的态度（即只承认异性结婚伴侣有资格获得官方的生育支持）。政府可以把能享受生育医疗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同性恋伴侣、单身女性和男性，以及其他属非常态的性别、性倾向与家庭结构的人群，通过这些重要措施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或许还能有助提高生育率。通过上述行动，中国不仅能保证一孩政策的终结不止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能传递关于新的社会发展优先目标的信息，最终在生育和人口工作方面获得其所一直渴望得到的国际认可。